

国内变迁与中非关系的变革

吉尤姆·穆穆尼

内容提要 在过去十五年来,中非关系发生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国际体系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冷战的结束,而更多的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国内变化的结果:(1)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其隐含着在中非关系中私营和半国营行为者的导入。这些行为者一方面致力于推进贸易和加强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同时又在东道国成为有争议的对象。(2)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它也暗示着国内力量如市民社会和各类政党参与到中非关系中来。由于非洲在中非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些力量为了各自的集团利益就成为中非关系的监督者,不时对各自的政府施以最大限度的压力。

关键词 国内变迁 中非关系的变革 改革开放 民主化进程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和非洲之间一直存在着各方面的特殊关系。这些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成为世界主要重大事件的汇合点。然而,中非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尤其是最近十五年以来,中非关系发生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并且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重要变化呢?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中非关系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国际体系效应的结果,比如说冷战的结束,而更多的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国内变化的结果。以下这些是基本的:(1)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其隐含着在中非关系中私营和半国营行为者的导入。

* 吉尤姆(Guillaume Moumouni),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贝宁留学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本文系作者2006年11月11—12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Domestic Transformations and Change in Sino-African Relations”的修改稿。作者谨向导师朱锋教授和李安山教授提供的建议和帮助致以诚挚的感谢。

这些行为者一方面致力于推进贸易和加强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同时又在东道国成为被争论的对象。(2) 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它也暗示着国内力量例如市民社会和各类政党参与到中非关系中来。由于非洲在中非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些力量为了各自的集团利益就成为中非关系的监督者,不时对各自的政府施以最大限度的压力。

首先,我们将简要考察中非关系的演进过程。接着我们会分析导致变化的三种动因:从意识形态政策到务实政策的转变;贸易、投资及其引起的非洲国家的不满;还有中国军售的棘手事件。对国内变迁的分析将集中在促成定性变化的动因和引起争论的领域上。

历史背景

很多年以来,中非关系一直被看作南南合作中的典范,即使是今天仍然如此。双方在历史上都曾经不同程度地遭受殖民统治。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当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后,中国和非洲都自然而然地宣称自己是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此外,冷战的爆发成为两者之间确定共同利益的一个突出的促进因素。它们在宣称不同任何一个阵营结盟的同时试图在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非关系的演进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初。新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敌视,接着是与苏联发生分裂,这增加了中国政府的被孤立程度。为了打破孤立,获得朋友,中国对非洲自由独立运动给予了广泛的支持,直到大部分的非洲国家获得独立。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中期。全面的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国和非洲的革命国家保持着良好的联系,给他们提供军事装备、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援助和培训,等等。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对外交关系做出了新的定义。非洲则由于自身的衰退和与中国关系的疏远而处于“失去的十年”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政体变化和对中非关系的一项新政策的实施,现在被认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要注意到 1955 年 4 月召开的万隆会议是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会议提倡的“万隆精神”旨在捍卫亚洲和非洲人民的独立,促进世界和平和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① 到 1955 年,只有五个非洲国家和稍多一些的亚洲国家获得了独立。难怪,万隆会议的基本原则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直到所有国家都

^① 谢意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第 101 页。

获得独立为止。^①

然而,使不结盟运动得以创立的万隆会议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行动准则而不是一个有效的行事平台,因为当时只有一小部分国家获得了独立,而这部分获得独立的国家也缺乏真正有效的能力来确保它们的不结盟主张得以实现。这样的状况甚至一直持续到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在国际上获得主权以后。此外,中国和这些国家与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模糊不清:既是在提出一种官方的不结盟主张,又是在贯彻一种抽身于两大阵营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利用与苏联结盟来反抗西方的孤立政策,而在 70 年代又利用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来反对当时所谓的苏联霸权。同样,在 70 年代,某些非洲国家在执行一条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路线的同时也站在西方阵营这一边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更为显著的是,当苏联因为其对当地的竞争对手的援助^②而变得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时候,一部分非洲国家和解放运动便转向中国寻求援助。

实际上,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对非洲的看法都是以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得到国际承认的生命攸关的需求为指导的。在中国看来,非洲无疑是“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约瑟夫·贝蒂尼(Joseph Bertini)总结说,非洲“也是一系列重大战争的一个战场。非洲被中国看成是世界上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沿阵地,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中苏冲突中又被看成是重要的中间地带,同时在北京和台北争夺在国际上被承认为真正的中国首都的战争中又被看成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持力量”。^③然而,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坚持其主要原因不是为了生存,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左翼的影响不断增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意识形态顽固坚持的一个顶峰。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大革命更多的是一种党内的领导阶层的争斗或者说权力的分配斗争,而不是一个文化或社会运动。它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国和非洲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很显著。例如,在 1967 年和 1969 年间,中国和一些非洲盟国例如肯尼亚、突尼斯、象牙海岸、马拉维、尼日尔和上沃尔特(现在的布基纳法索)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恶化或者冷却的现象。但是这一时期一些非洲国家内部的政体改变(达荷美/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加纳在 1966 年都在生变)^④也成为造成中非关系分裂和动荡的因素。然而,推动这种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中国对非洲的看法——后来被发展成为国家政策——认为非洲是共产主义能够得以扩展的沃土。^⑤但是这一议程对于那些

① 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第 97 页。

② Christopher Claphan,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4.

③ Joseph Bertini, “Sino-African Relations: 1949—1970”, p. 1. <http://jvbert.people.wm.edu>, April 26, 2006.

④ 谢意显主编:同上书,第 257—258 页。

⑤ Joseph Bertini, op. cit., p. 5.

新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来说远远谈不上具有优先权,甚至对于其中的亲华者来说也是如此。当时坦桑尼亚的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对非洲国家的观点做出了最好的回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原则和我们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都是不可出卖的。”^①以上只是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蜜月关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时遭到破坏。同样,全面合作的道路充满了潜在危机和障碍的例子,尽管中国在寻求合作之路上投入了很多资源。从 1961 年至 1975 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高达 3.65 亿美元,占这一时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总额的 42% 多。^②但看起来这些资源的使用并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当然,多亏了 26 个非洲国家的帮助,中国才得以成功地将台湾合法地驱逐出联合国并且重新获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也是得益于它的非洲盟友的支持从而挫败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中国的提案。

这些都是革命年代留下的部分遗产,到现在中国还从中受益。在 2004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60 次大会上,中国第 11 次成功挫败了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人权会谴责提案。在 28 个支持中国的国家中有 15 个国家是非洲国家,而整个亚洲却只有区区 10 票的支持。^③中国现在享有的与坦桑尼亚、埃及、赞比亚、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特殊关系都是革命年代的遗产。

此外,中国和以前的非洲统一组织(现在的非洲联盟)之间实现了持久而富有成效的合作。非洲联盟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将台湾看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上始终保持一致。对于中国来说,非洲联盟应该在对中国的政治支持上获得回报。此后,中国的部分援助一直源源不断地输往非洲联盟。非盟甚至作为中间人向非洲国家及其解放运动输入了中国的一些军事支持。例如 1974 年,非统解放委员会从中国得到了 2000 件轻便武器。^④

中非关系中的变革

中非关系中的变革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意识形态政策到务实政策的转变;贸易、投资和非洲国家的不满;军售问题。中国对非洲的武器销售其实已经不是一种新的活动了。在非洲国家从殖民地获得解放的时期,它们就曾以获得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的形式来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是现在销售的范围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现象:自由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也包括了武器销售在内。这是中非关系中的一个新因

① Joseph Bertini, op. cit., p. 8.

② 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政策的调适与转变》,提交 2006 年 11 月 11—12 日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第 4 页。

③ 徐敦信主编:同上书,第 98 页。

④ 李保平、马锐敏主编:《非洲变革与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5 页。

素,这一因素使得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可能产生不和。由于军售问题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本文下面将不展开讨论。

(一) 从意识形态政策到务实政策的转变

胡锦涛主席在 2004 年访问加蓬期间曾坦率地说:从今以后中国将像其他大国一样根据自己的切实利益行事。不管是在原材料、潜在市场还是外交影响方面,它将着力与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进行合作,为此而做出努力。^①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意识形态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都是中非关系的中心。从其他方面看来,中国确实是以意识形态的一揽子方案来满足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要求确保自主权和社会发展的意愿。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敌对状态更使中国谋求加强对非洲大陆的意识形态控制。这种政策的结果并不很理想。一方面,中国通过与非洲的友谊成功地建立了双方的历史联系。但另一方面,只有很少的非洲国家接受了中国的革命诉求。结果,友好联系并没有在经济交往方面得以维持。

当然,冷战是造成这样一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还存在着一些比较边缘性的事件,如前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有一些零星的脱离其西方阵营的举动,如与中国或者苏联进行一些小宗交易。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从意识形态政策向务实政策的转变,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贸易激增;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基础上,双方的合作范围扩大;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双方贸易额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增长了 700%,从 2002 年到 2003 年又增长了一倍,达到了 185 亿美元。^② 2005 年,中非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高达 397 亿美元。根据预料,到 2010 年中非贸易将突破 1000 亿美元。^③

同样,由于合作领域的拓宽,在冷战结束后中非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 2000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部长级会议的中非合作论坛。那次会议达成了两项文件:(1)《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这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宣言,它总结了双方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一系列共识,尤其是所谓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这一问题。宣言还重申了平等互利的原则。(2)《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这是一个包含经济、贸易、农业、旅游、科学、文化、健康、环境等广泛领域的合作

^① Andrew Alexander, "Pawn or Partner", http://www.china-in-afric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Itemid=33, April 26, 2006.

^② Esther Pan, "China, Africa and Oil",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9557/>, October 17, 2006.

^③ Ian Taylor, "Unpacking China's Resource Diplomacy in Africa", p. 1. Paper Submitted to the Workshop "China-Africa Relations: Engag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rganized by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Center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vember 11—12, 2006.

计划。^①

此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在 2006 年底达到了数目空前的 48 个。2006 年 11 月 3—5 日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见证了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事实上,中国在当今世界扮演的全球角色和非洲拥有的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得到了双方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在其国土之下发现重要的石油储藏。因此,探测和提炼石油成为中非关系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尤其是中国自 1993 年变成一个石油净输入国以来,在 2003 年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

(二) 贸易、投资和非方的不满

中非贸易和投资的一揽子方案引起了非洲对于自身受到的一系列利益损害的关注。非洲重大的贸易逆差、纺织品和服装领域受到的干扰,在中国投资项目中当地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等等,这些都受到了重点关注。

首先,中非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理论上根源于其各自的经济特性: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中心,而非洲仍然是一个以进口高附加值制成品和出口低附加值原材料为主的地区。即使是南非这个撒哈拉以南最发达的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也从 1992 年的 2400 万美元跃升到 2004 年的 4 亿美元。^② 还有统计指出,南非占中非贸易总额的 20%,且 2004 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 25 亿美元。^③ 谈到中国和南非之间的贸易,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副所长莫莱茨·姆贝基(Moeletsi Mbeki)说中国“同时代表了一个挑战性的机遇和一个极大的威胁”。^④ 然而,由于一些非洲国家石油业的兴旺,中非之间的贸易在过去两年间已经多多少少处于平衡状态。一些数据表明,在 2005 年的前十个月中,非洲向中国出口是 169.2 亿美元,从中国进口仅为 152.5 亿美元。^⑤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到 2005 年末的话,那么非洲在和中国的往来中将第一次享有贸易顺差。当然非洲各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各自有着极大的不同。那些少数改善了自身的贸易平衡状况的国家都是石油生产国。

① Ambassador Liu Guijin, “All Weather Friends in Need and Indeed: China-Africa Relations Seen from the Eyes of a Chinese Diplomat”, *African Renaissance*, July/August 2005.

② Marie-France Cros, “Diplomatie/commerce: le nouvel ordre chinois en Afrique”, www.africatime.com/benin, April 26, 2006.

③ Lyal White and Phil Alves, “China in Africa: A Relationship of (Un) equal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3, Iss. 1, Summer/Autumn 2006, p. 56.

④ Jean-Christophe Servant, “China's Trade Safari in Africa”, <http://incommunicado.info/node/170>, April 26, 2006.

⑤ *Foreign Investment Network*, Spring 2006, p. 17.

其次,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好,纺织品和服装这一非常棘手的问题将给中非关系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那些纺织品工业为其主要相对优势的非洲国家,它们对于中国控制这一部门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满。从中国进口的一个结果是衣服变得越来越便宜(这点让大部分的消费者感到满意),但是相反,当地的生产者已无力继续与中国的厂商竞争。在南非,廉价的中国进口品使得当地的纺织品和服装部门削减了大约 2500 个工作机会。^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N. Lyman)认为,到 2002 年年底,南非大约有 75000 人由于中国的竞争而失去工作。^② 因此,当地工厂主和工人都要求国家提供贸易保护,教会的主教和反对党领袖托尼·利昂^③也都参与了进来。在塞内加尔,工会已经对他们所谓的中国商人的“不忠诚的贸易”举行了游行示威。同时,消费者们则回答说:“让中国人生活在安宁之中吧”。^④ 在贝宁,当地的批发商对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纺织品进口商表示不满。主要原因在于这使得他们不再能控制进口纺织品对零售商的分配。后者现在可以直接向国外进口商购买,这就破坏了批发商的商机和利益。

此外,由于多种纤维协定(MFA)的终止,世贸组织于 2005 年取消了对中国出口的配额限制,人们疑虑此后非洲的纺织品是否只能格外侥幸地在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上生存下去,即便是在诸如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等优惠待遇协定的帮助之下。例如,南非对美国的服装销售从 2004 年第一季度的 2600 万美元猛然跌至 2005 年同期的 1200 万美元。^⑤ 尼日利亚不得不对纺织品进口采取限制以保护本国的生产。但是中国和尼日利亚的走私者们仍旧继续通过北方诸州如卡奇纳州和吉加洼州每月向尼日利亚输入数以千计的货柜。^⑥

一些非洲的纺织品工厂已经倒闭,据推测是因为中国的竞争所致。^{*} 莱索托在 2005 年有超过十间服装工厂关门。^⑦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一揽子方案看成是试图缓和由于贸易所引起的非洲国家的不满情绪。但是这些援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和这种情绪呢?

第三,非洲国家不满情绪的另外一个来源,主要是在中国投资和有中国企业竞标成功的非洲项目中,中国政府和在非洲的中国公司大量雇用的是中国的劳动力。

① See, Princeton N. Lyman's "China's Rising Role in Africa", presentation to the US-China Commission on July 21, 2005.

② Ibid.

③ Ibid.

④ Marie-France Cros, op. cit.

⑤ Princeton N. Lyman, op. cit.

⑥ 作者三次赴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州(Kano state)进行考察,发现中国纺织品的走私路线是从尼日尔共和国通过卡奇纳州(Katsina state)和吉加洼州(Jigawa state)进入卡诺州。

⑦ Princeton N. Lyman, op. cit.

人们确信中国在实施建筑协议的同时输出了几乎大部分其所需要的劳动力。^①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非洲有不下 78,000 名中国工人。去年,安哥拉能源部长预料在五年内约 300 万中国人将移民到安哥拉。^② 这显然将使安哥拉的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安哥拉政府于 2004 年签订的 20 亿美元的贷款协议中,有一项规定说只有 30% 的重建工程可以转包给安哥拉的公司,剩下的 70% 对中国的企业开放,这引起了安哥拉企业家们的极度不满。^③

中非关系变革的内部因素

(一) 中国的国内变迁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随着毛主席的逝世而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触发了中国国内体系的显著变迁。

1976 年打倒“四人帮”以及 1980 年的审判,标志着妨碍外交事务,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和经济、文化、教育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为一个改革政策的长期拥护者,现在他有机会开始将他长期以来设想的中国改革和向世界开放的蓝图付诸实施。毛泽东认为,整个世界的弊病必须通过革命和战争方能得以治愈。邓小平对世界的看法则更积极一些,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是被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出发点,即邓小平的注重实务的改革。^④ 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力,而开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认识到非洲并不是增加外国投资的合适的伙伴后,中国政府现在只有选择在商贸和原材料开采等方面与非洲进行合作,以提高生产力和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

1988—1989 年间的南京抗议事件^⑤,1989 年的“六四风波”,这两个事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发生,给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非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当时,对中国至关重要是与那些对南京抗议做出回应、表示想要召回本国学生的非洲国家加强友好合作。此外,天安门事件使得中国受到西方的完全孤立。

① 作者从 1995 年至 1998 年跟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水坝组工作过,并发现有关当地工人无技术的言论不成立。

② Marie-France Cros, op. cit.

③ Jean-Christophe Servant, op. cit.

④ James C.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six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9, p. 33.

⑤ 1988 年 12 月至翌年 1 月份的南京骚乱原来是河海大学的一个个别的事件。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学生住宿条件和教育津贴差于非洲留学生,另一方面是中国学生不喜欢非洲男子接触中国女子,导致对非洲人的怨恨。这种抗议非洲人的暴力情绪很快就蔓延到北京、上海等中国其他城市。见 <http://bbs.cjdbj.net/viewthread.php?tid=286046>。

为了打破这种孤立状态,中国遂转向它的非洲盟友们。另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国内的能源短缺和非洲广阔的制成品消费市场更增强了非洲对中国的战略性作用。

现在中国企业家与商人通往非洲的道路已经被铺就,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这些活动者经常能够确保一种对于中央政府的相对自主权。其中一些人甚至对中国驻非洲国家的大使馆所起到的“被动”作用公然提出批评。这些人对当地法律的不遵守^①,以及中国商人或承包商对当地工人的不义的待遇,与中央政府想要在海外树立中国好形象的政策是毫不相干的。其实,这些企业家是把国内的陋习输出到国外,^②即你争我夺、劳工风险大、把公司盈利建立在市场份额或垄断之上(其最终目标是打倒竞争对手,这是中商在控制市场的前提下敢于亏本的原因所在)、工资低得离谱、中商几乎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等等。

从非洲角度来看,内部力量的演变是中非关系不可避免的因素。

(二) 非洲国家的国内变迁

在普遍的腐败、腐朽统治和残暴专政的背景下,大部分非洲国家以经济混乱和社会剧变的形式结束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失去的十年”。国内曾经以地下活动为主的反抗力量(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工会、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现在都勇敢地站出来担负起领导剧变的责任。这些力量的主要主张是民主和人民的幸福。“民主化毫无疑问是与诸如不平等、发展或者结构调整计划等议题相关的。与此相关,国家的镇压是与民主治理相对立的,它被与种族隔离、人种划分、宗教冲突以及类似事件联系起来。”^③贝宁是非洲第一个在 1990 年 2 月从“铁板一块”到整体多党制实行和平转变的国家。此后,这一运动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

要想明白社会力量在中非关系中变得有多么重要,就必须回顾一下这些力量在非洲民主政治的成果中所起到的作用。从精英到大众,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将独裁者驱逐出权力中心。学生和文职人员的工会通过罢工和静坐等温和抵抗手段,确保了对于国家控制的相对自主权。宗教组织尤其是教派圣会组织则惯常以他们“政治布道”的方式将人民大量集中起来。一些专业协会也“在对政治改革的压力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④草根阶层的运动要么被自发组织,要么

① 包括进口一些海关价值被低估的货物、假报关、逃税、洗钱、非法移民到欧美国家,等等。

②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曾在 2006 年 11 月 11 日的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中商在非洲是传播国内“不正常的功能”(diffusion of dysfunctions)。

③ Earl Conteh-Morgan,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The Theory and Dynamic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first edi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p. 4.

④ John A. Wiseman,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ub-Saharan Africa*, first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5.

被这些不同的组织在支持政治改革的旗帜下组织起来。铁板一块的非洲国家政权在这样的基础上被连根拔起。

在非洲国家看来,从意识形态政策到务实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中非关系的范围和性质发生了转变,是民主政治需要的结果:(1) 人们确信不受欢迎的、被西方强加的结构调整方案(SAPs)已经失败,而在民主化进程中得到授权的社会力量正在寻求其他方案。在拒绝对非洲进行援助和坚持“经济效率及其严厉措施”的同时,西方被认为正在“为军事干涉创造条件”。^① 由于结构调整计划的原因,一些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正在面临合法性危机。^② (2) 在整个非洲范围内,人们都不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深信不疑,这与中国对外政策中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移除是一致的。然而,上文也提到,非洲国家的国内力量也在不断回应一些与中国关系相关的不满情绪。2006 年 9 月 28 日赞比亚的总统选举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标志。赞比亚大学的政治学者斯穆塔尼(Neo Simutanyi)认为,由反对党候选人萨塔(Michael Sata)所激起的反华情绪让其在中国人对赞比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卢萨卡和青铜地带(Cooper belt)非常受欢迎。^③ 虽然利维·姆瓦纳瓦萨(Levy Mwanawasa)总统赢得了选举,但是萨塔在卢萨卡和青铜地带的选票数目远远领先于他。^④

另外,非洲政府和开采资源的跨国公司历来串通一气。这是因为双方的利益普遍相连:政府有义务用权力和权威来保护跨国公司,后者的责任是给政府提供为其政治生存所需要的财源。虽然政府和跨国公司能通过任命权和封口钱来确保地区领导人的服从,但是总有一大块地区力量不断反对和干扰两者之间的串联。^⑤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中国石油跨国公司在与非洲国家做生意时离不开上文分析的总趋向。这些跨国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是奥格尼(Ogoni)民族的叛军的目标之一;在苏丹的冲突地区中国跨国公司同样受到武装分子的威胁。

结 论

中国和非洲在双边层次和国际层次上仍然共享很多利益。双方成功地加强了

① Earl Conteh-Morgan, op. cit., p. 138.

② Ibid.

③ Isabel Chimangeni, “Economie-Zambie: la Présence Croissante de la Chine Rencontre une Résistance”, http://www.ipsinternational.org/fr/_note.asp?idnews=3309, November 9, 2006.

④ Ibid.

⑤ Cyril I. Obi, “Global, State and Local Intersections: Power, Authority and Conflict in the Niger Delta Oil Communities”, in Thomas M. Callaghy et al., eds., *Interven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Africa: Global-Local Networks of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3—175.

联系并拓宽了两者之间合作关系的领域,成功地从以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合作动因的时代翻开合作的新篇章。国内的需要要求中国寻求原材料产地和限制台湾,同时促进贸易和加强与非洲的政治联系,以此来扮演好一个日益重要的全球角色。国内的需求要求非洲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同时开发非洲大陆上蕴藏丰富的原材料和进入广大的中国市场,还要加强与中国的政治联系以便在安理会中起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作用。

然而,国内力量在中非关系中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利。在中国国内,这些力量缺乏可以允许他们不与中央政府的规定保持一致行动的自主权。但是在中国大陆以外,他们可以确保得到这样一个自主权,用来促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也激起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而从中国人的这些手段和实践中受到损害的当地人和寻求选举支持的政客们,则会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中非合作更符合非洲的利益。

那么,关键的是在非洲哪些联合力量有足够的权力来监督和控制中国人?中国是非洲的合作伙伴,但中国也有其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说台湾问题。在这一点上赞比亚再次给了我们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据赞比亚媒体报道,中国驻卢萨卡的大使李保东曾发出警告说,如果反对党领袖萨塔赢得选举(和承认台湾)的话,北京将有可能断绝与赞比亚的外交关系。^①

此外,中国已经做出承诺要保护从苏丹油田到红海的石油管道。^② 那么中国是否会在非洲全力实施其“软实力”的实践上走得更远呢?

^① Jeremy Goldkorn, "China Intervenes in Zambian Election", http://www.danwei.org/danwei_noon_report/post_19.php, November 9, 2006.

^② Reported by Peter Goodman of the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9/24/AR2006092400915_pf.html, November 9, 2006.